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左 传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上册】



中華書局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左传 上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传/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08833-5

I. 左… II. ①郭…②程…③李…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
编年体②《左传》-译文③《左传》-注释 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428 号

书 名	左 传(全三册)
译 注 者	郭 丹 程小青 李彬源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¼ 字数 1100 千字
印 刷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833-5
定 价	156.00 元

前 言

中国史学的发轫期，根据现存的文献，当在西周、春秋时期。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仅是传说，是否史籍，真伪难辨。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才有完整的史书，如周王朝有《周书》《周志》，郑国有《郑志》《郑书》，楚国有《楚书》《机栲》，晋国有《乘》。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篇引）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只是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亡佚，其体制与内容，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了。流传至今的，只有《尚书》、《春秋》等少数几部史书。

《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记事的史书为《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订。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最早的私家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就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按照这十二公的次序来记载历史大事，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春秋》的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作为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著作，《春秋》的首要特点是有了明

确的时间顺序。作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按时序将历史事件排列起来，有所取舍，有详有略。这一点，比之《尚书》是一大进步。《尚书》没有时序，为后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带来许多不便。《春秋》编年的记史方法，不但是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观的发展与进步。《春秋》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依据，客观上也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这是史学观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记事“谨严”。（韩愈《进学解》说：“《春秋》谨严。”）所谓“谨严”，指的是遣词用字一丝不苟。这个风格，源自于《春秋》的“书法”。举例来说，《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左传》中有一段解释《经》文的话：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为共叔段与兄争国，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经》文不称之为“弟段”。郑庄公与叔段之战，宛如两国之君交战，郑庄公打败了对方，所以说“克”。《经》文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意在讥讽郑庄公有失教弟之责，有意养成其恶。叔段败后逃亡共地，《经》文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也有罪，史家又难以下笔，为尊者讳，所以不说“出奔”。可见《春秋》的用语是非常谨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要以一字之褒贬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因此特别重视遣词造句。这与孔子著《春秋》的目的是相统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通过历史事件尤其是人事的记载，达到“劝”与“惩”的目的，自古以

来就有这个传统。《春秋》中的“书法”，在孔子以前的史官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只是到了孔子依鲁史记修《春秋》，把这种手法加以系统化和模式化，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惩恶劝善”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以至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春秋》谨严的特点，其弊在于记事过于简略。《春秋》所记之事，少者一事仅一字，最多者也不过四十余字。如此简略的记载，只类似于今天的标题新闻。作为一部史书，它无法使人们了解历史运动的全过程，更无法使人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乃是春秋初年发生于郑国的一件大事，但《春秋》隐公元年仅以上述六字记之。这样简略的记载，读者不但对于郑庄公兄弟阋墙、母子构怨的经过无法了解，更无从知道春秋初年的小霸郑庄公在暴兴于诸侯之前为巩固君位、肃清内部障碍而消灭共叔段势力所起的历史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六经”之中，《春秋》是非常重要的著作，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孔子作《春秋》并非单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目的在于匡救时弊，惩恶劝善。但是，《春秋》经文隐晦难晓，又蕴含褒贬，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儒家经典，到了东汉前期，“经”的范围已经扩大，连解“经”的“传”、“记”、“诂”等也引进“经”内，上升到“经”的地位。“三传”也成为经书。唐代正定“五经”，实际上包含了“九经”，就是《易》、《书》、《诗》、三《礼》和三《传》。宋代以后，“十三经”这一套儒家经典著作基本形成，《左传》成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著作。

在西汉的今古文经学的分野之中，《左传》属于古文经学，《公羊传》、《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左传》进行的，特别是刘歆是否伪造《左传》之争。这一论争，不但在汉代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桩公案一直延续到清末。尽管如此，经

过汉代刘歆、贾逵、服虔、郑玄以及晋代杜预等学者的弘扬推崇,《左传》在“十三经”中已越来越被重视了。

关于《左传》,有几个问题需要谈谈。

一、《左传》书名

《左传》,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恐怕是有关《左传》的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也称为“左氏春秋”。又因为《左传》为秦火前遗书,所以又有“《春秋》古文”之称。《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春秋》古文”即指《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称“及(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歆传》),又称:“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又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同前引)班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时人又称为《左氏》、《左氏传》。在《汉书》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混用的情况。它如何变成《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呢?沈玉成先生认为:“经过一段时期,人们逐渐觉得《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要比《左氏春秋》准确,于是就为学人所习惯使用,简称《左传》。”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是左丘明（见前引）。班固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说：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此说并非盲目地附和史迁。大家知道，《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来自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所以向、歆父子也是持此看法的。此外，两汉至魏晋的一些大儒硕彦如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人，皆无异辞。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此后，持怀疑论者代不乏人。清代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是刘歆割袭《国语》伪造。但是，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变迁，聚散无常，加上古代转写流传印刷条件之限制，常有后人增损窜入，总会发现与原书抵牾矛盾之处。所以持怀疑论者虽然提出了一些证据，终觉文献不足征，难以使人信服。

三、《左传》的成书年代

《左传》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前期。关于《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在春秋末期，有的认为应在战国中期，两说皆自古延续至今。实际上先秦史书与诸子著作一样，有一个口头传诵的授受过程。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把一部近二十万字、包融各诸侯国史实和史料的巨著划定于一个短时期内甚至若干年内编撰而成，是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的。有的学者认为，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

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而且《左传》的口头传诵,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授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和其中一些文字上的战国文风,也是在传授过程中加入的。这种看法,不妨可作为我们了解《左传》成书的时间和过程的参考。

四、《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即《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古者释经为之“传”。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左传》是解经之作。东汉刘歆、陈元、韩歆、贾逵、郑众等古文经学家也都认定《左传》为解经之作。但是西汉末今文学家出于政治功利上和争立博士官的需要,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此后,传经与否的争论,久讼未决。虽然桓谭、杜预、孔颖达以及近代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坚持传《经》之说。但是自两汉直至现当代,认定《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不存在互相依附关系的学者仍然大有人在。对于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本来不足为怪,也不必作出强制性的统一。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时提出的意见,颇值得我们重视。

杨伯峻先生指出:《左传》解释《春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春秋左传注前言》)。杨伯峻是主张《左传》解经说的,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他立论的根据。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左传》与《春秋》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与内在的关系。可以说,《左传》与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左传 上》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71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